

■ 谢南斗 / 著

自然派

研究

ZI RAN PAI YAN JIU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ZI RAN PAI YAN JIU

■ 谢南斗 / 著

自然派
研究

ZI RAN PAI YAN JIU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ZI RAN PAI YAN JI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然派研究 / 谢南斗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3

ISBN7—81081—000—6/I·001

I. 自... II. 谢... III. 文学流派, 自然派—研究—
俄罗斯 IV. I5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425 号

自然派研究

谢南斗 著

责任编辑: 刘苏华

责任校对: 全 健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岳麓山)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核工业中南二三〇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开 10印张 225千字

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7—81081—000—6/I·001

定价: 22.00元

目 录

第一章	自然派研究	1
1	自然派:流派生成与嬗变	
13	自然派风格特色	
第二章	果戈理研究	21
29	早期作品纵览	
31	《钦差大臣》:含泪的笑	
34	《彼得堡故事》:小人物主题	
35	《死魂灵》:本性与恶习	
第三章	屠格涅夫研究	46
47	辉煌的文学地位	
62	屠格涅夫的社会观	
70	《猎人笔记》:为人生的图画	
80	《罗亭》:宣传家的悲哀	
93	《贵族之家》:爱情的失落	
105	《前夜》:时代的变奏	
118	《父与子》:新人的肖像	
128	后期作品:无言的困惑	



第四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 133

- 134 奇诡绚丽的艺术风格
- 155 自然派风格的承传与变异
- 164 逆程式的情节构思系统
- 181 纷繁复杂的思想系统
- 194 与现代主义的渊源
- 200 二重人格问题
- 211 理想人物问题

第五章 托尔斯泰研究 216

- 231 托尔斯泰与老子
- 244 中短篇小说综述
- 253 《战争与和平》：人民高于一切
- 262 《安娜·卡列尼娜》：时代的侧影
- 276 《复活》：决裂与抗议
- 310 戏剧：平民化尝试



第一章 自然派研究

自然派：流派生成与嬗变

纵观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轨迹，自然派是最奇诡最壮丽的文学现象之一。几乎19世纪俄罗斯所有的大师级风流人物，都同这一流派有着不解之缘。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他们都在自然派这块丰饶的艺术园地里生活过，奋斗过，并且用自己辛劳的汗水和瑰丽的艺术才华，将这一流派推上了无限荣耀的峰巅。自然派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影响竟然如此深远，如此巨大，以致我们在讨论俄罗斯文学辉煌历程的时候，便无法绕开自然派这个沉重的话题。

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文学，这一推断似乎已经成为不刊之论。文学史家可以为此而列出长长一列望不到尽头的名单加以证明：古希腊伯里克利斯执政的民主制度繁荣时代，产生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等一大批名垂青史的悲剧大师；而古罗马最为繁盛的奥古斯都时期，则产生了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等等辉耀千古的诗人。史家还可以列出更多更长的史料，证明自己理论的完美无瑕。例如，英国伊丽莎白繁荣时期，产生了艺术巨



星莎士比亚,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时期,产生了最卓越的喜剧大师莫里哀。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依据这种古老的归纳法,人们可以不假思索地进行一次更为简便快捷的逻辑演绎,即强势的时代产生强势的文学。那么依据这一推断,弱势的时代则必然产生衰朽不堪的弱势文学了。然而严峻的历史却从来不会依照人们的主观愿望来运行自己的日月潮汐,我们同样可以举出无数个事例,证明弱势的时代同样也能产生强势的文学。例如在14世纪分崩离析和灾难深重的意大利,出现了最伟大的诗人但丁;16世纪满目疮痍的西班牙,却产生了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小说家塞万提斯。在这个礼崩乐坏民不聊生的时代诞生的艺术巨著《堂·吉珂德》,已经成为人类最引人注目的艺术瑰宝之一。那位苦脸骑士所带来的艺术效应,影响了整整四个世纪人类的思维,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从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中,发现他不朽的艺术基因。总之,不论是评说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文学,或者是评说弱势的时代产生强势的文学,这类看似滴水不漏的定论都显得过于武断,过于主观,并且不能印证千百年来人类文学发展的史实。这类学说的理论依据,无非是在一次又一次地复写自然主义的环境决定论。且不说其理论建构体系中形而上学的苍白,单说这类直线因果式的简单化思维,就足以使人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

从艺术发生学这一特定的思维视角来重新观照文学流派或者文学本身的发展进程,人们便不难发现一个艺术生成最基本的规律:任何一个文艺流派的产生、发展、强盛和衰落,都存在着一个十分明显的生命周期,都必须遵循自身生命演绎的内在逻辑规律生成、发展和运作,这就是艺术流派的生命周期律。同时,任何流派的生成发展过程,都存在一个动态的充满鲜活生命元

气的自我调适过程。它必须具备满足自己生长的生命条件和环境温床。在这影响艺术流派生成发展的诸多条件中,时代条件固然是十分重要的条件,但决不是惟一的条件,更不是决定的条件。由于艺术流派有其内在的生成规律,而其中最根本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条件,则是这一流派所能获得的动力和能量,其中包括前一代艺术家所能提供的发展能量,以及新一代艺术家的人文素质和创新精神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穿透力和震慑力。毫无疑问,研究艺术流派的动力和能量是艺术发生学最显著的特色,也是其最基本的理论价值平台。

文学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文学艺术的本质也在于创造。作为人类精神文明最伟大最丰硕的成果,文学艺术本身就是无数作家用心血和智慧堆砌起来的瑰丽殿堂。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的才华和心血就成为艺术生命延绵发展的动力和能量。艺术发生学的开山鼻祖、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柏格森在他的不朽名著《创造进化论》中说得很清楚:“绵延是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创造是自我绵延的动力。”(柏格森,《创造进化论》,第85页,香港万里书店,1968年。)依据这一观点,艺术人力资本、亦即艺术家生命个体的创造能力也就构成了文学流派繁荣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构成了民族艺术走向繁荣昌盛的决定力量。换句话说,前一代作家所积累的创造能量,再加上新一代作家所能爆发的创造能量,形成一个强大的艺术张力场,从而建构了艺术流派生成发展的先决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创造能量的生成,以及其在时代条件下所能提供的积累,也就决定了艺术流派成就的大小和辐射能力的高低。

既然任何一个流派的生成发展都受到其文学的内在生成机制和艺术张力场的决定,那么时代条件是否就不能对流派的生

成发展产生影响和作用呢?回答也必然是否定的。透视俄国自然派的发展轨迹,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洞察到时代条件的重大作用。众所周知,自然派是弱势的时代环境中产生的强势文化。这种弱势的环境非但没有削弱或者扼杀它的生命活力和发展势头,反而为它的成长提供了适宜的温床。其理由是不言而喻的,自然派所产生的40年代,处于史家公认的停滞时期。在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双重挤压下,整个社会失落了价值取向,陷入了困境与危机。沙皇文化警察制度竭力压制人们的思想,书刊检查制度则毫不迟疑地摧残一切进步刊物和书籍。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正由于沙皇统治的黑暗与停滞,导致了整个统治阶级醉生梦死,也导致了整个官僚集团规模空前的腐败和堕落。正由于这种扼杀一切活力的停滞,大大钝化了统治集团的政治嗅觉和文化敏感,导致统治集团官僚主义横行,文牍主义泛滥。这正如托尔斯泰在《复活》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官员们“仅仅考虑法律条文的引用是否得当,而根本就不在意案件的是非曲直”。可见,官僚统治的强化带来了官僚效率的弱化,黑暗与停滞的积累造成了官僚腐败的积累,使得整个官僚集团办事效率低下,整个官僚程序的运作陷入了冠冕堂皇的公文旅行和无休无止的机构扯皮之中,其最终的结局,必定是文化检查制度的失控。这正如果戈理在《死魂灵》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官僚机构“像生了锈的齿轮轧轧发响”。文化官僚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失去了起码的辨别能力。例如沙皇尼古拉在彼得堡大剧院亲自审查《钦差大臣》,看完以后他竟然官样文章地评述说:“嗯,真是一出好戏,大家都满意,我比大家更满意。”(《回忆果戈理》,第26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其他的大臣也随声附合,把戏剧里面的笑话夸奖了一通。如果说,行政官员由于素质低下,对

于艺术作品一窍不通,因而放过了眼前的漏网之鱼,那么专职的书刊检查官的缺乏敬业精神和玩忽职守,则成为沙皇文化检查制度的致命漏洞。例如1848年2月,屠格涅夫出版批判农奴制度最为激烈的作品《猎人笔记》,仅仅因为安年科夫同书报检查官阿法纳西打了个招呼,检查官则大笔一挥:“准予出版。”由此可见,专制的腐败导致了统治阶级文化失控,这便是自然派得以繁荣昌盛的时代原因。

更值得一提的是,沙皇专制制度的效率低下和腐败堕落,不仅导致了文化失控,而且导致了思想失控,使得大批宣传欧洲资产阶级进步思想文化的书刊源源不断地流入俄国本土,以至于附庸风雅的贵族书房里,摆满了启蒙主义文化书籍。例如《贵族之家》中的拉夫列茨基的书房里,竟然赫赫然地安放着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书籍,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以及康德、黑格尔的许多著作。由此可见,充满叛逆色彩的异质文化对传统文化的试探与触摸,其结果是复制了大量反传统反专制的思想基因,从而为自然派的兴旺发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文精神滋润和永不枯竭的思想营养。这一全新的思维价值参照系的创立,为自然派的生成发展,创造了极为适宜的生成条件。

同时,自然派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为自己造势,建构自己具有巨大生命活力的强势文化和主流文化,以至于风行俄罗斯文坛长达20年之久,这也得力于整个民族文化动力和能量的积累。民族文化的积累使得自然派得以建立在一个规格很高的艺术起点上,进而形成一览天下和高屋建瓴的文化态势,由此而获得强劲的文化势能。没有这类文化势能的积累,自然派的繁荣同样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前一辈艺术家普希金、莱蒙托夫和卡拉姆津

的造势作用,对于自然派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从文化生态和文学生长周期这一层面考察,自然派的出现完全出于历史的必然,或者说是俄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并成为俄国这块特定的历史土壤中开放的绚丽奇葩。从17世纪罗蒙诺索夫、斯莫特里茨基引进法国古典主义开始,俄国文学这株小小的幼芽经过一百多年的缓慢生长,先后出现了巴伊日科夫、索洛维约夫、利日斯基、康捷米尔、苏马罗科夫、冯维辛、杰尔查文、卡拉姆津和茹科夫斯基等一代又一代辛劳耕耘的文学家。他们尽管没有能够完全摆脱对西欧文学的模仿,但是却在不断地聚集能量,不断地进行文学探索,并且积累了相当厚重的文学经验。最后在普希金手里,完成了一个文学生态发展的小循环周期。更重要的是,在俄罗斯文学流转嬗变的发展链条中,普希金的创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位天才的预言家,“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不仅以非凡的艺术功力和英勇无畏的艺术胆识,开创了俄罗斯民族文学,而且他在文学体裁和文学技巧方面,也同样作出了极其可贵的尝试。他以伟大的创新精神,开创了俄罗斯民族语言,开创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开创了具有俄国民族风格的诗体小说,同时他也开创了人道主义传统和小人物主题。这就为自然派的出现,建造了一座极其宽阔的价值平台。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条件都已经具备,前一辈作家用自己的双手造就了适宜的文学土壤、文学气候和文学营养,自然派的横空出世,也就成为顺理成章和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普希金将一切条件都已经准备停当,他也当之无愧地担当了自然派父亲的角色。

关于自然派的成长周期,也同样体现出文学发展内在规律的严格性与历史逻辑的完整性。依照别林斯基的说法,自然派



的产生,应该从1836年4月在彼得堡剧院公演果戈理的名著《钦差大臣》开始。他评述说:“从1836年我国广大公众读过《密尔格拉得》和《钦差大臣》起,我国文学的全部进程,它的发展和全部本质,都包括在新学派的成就中。”(《别林斯基全集》,第4卷,第488页,莫斯科,1953年。)其全新的时代意义,恰在于它对自我人格的高高张扬,对民族尊严的广泛认同。因此,别林斯基举起双手欢呼自然派,并大声赞美说,自然派体现了“我国社会对自我意识的追求”,“实现了完全成为民族的、俄国的、独创的、有独立风格的俄国文学的要求”。自然派之所以非同凡响,是因为它摒弃了一切温情脉脉的虚伪和矫饰,赤裸裸地投影出生活的原生态,即使描写最肮脏最丑恶的东西也决不退缩,从而为俄国文学树立了一种崭新的风范。因而别林斯基一针见血地作出结论说,自然派是“俄国社会的表现和镜子”,并且在文学视野中毫不惋惜地清除了“一切伪造的、虚假的、不自然的东西”。

从严格的意义上审视,自然派从来就不是一个十分严谨的文学流派,它的结构形态十分松散,既无明确的组织,也无明确的纲领,它甚至从来就没有发表过一份带有观念性的文学宣言。自然派原本就是一些遭人白眼饱受奚落的丑小鸭,这里聚集着一群毫无名气也毫无地位的年轻作家。他们在文坛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力图发出一种同正统官方格调不相兼容的、完全属于自己的声音。于是,他们的创作便引起了《莫斯科人》、《北方蜜蜂》等正统派、权威派刊物的强烈不满,并且被这类权威诅咒为“自然派”。自然派作家之所以受到无情的嘲笑,是因为他们决计不肯迎合时尚流行的浪漫主义趣味,趋同于高雅轻松的贵族理想主义。更为离经叛道的是,这些年轻人敢于将描写的视野转向最丑陋、最阴暗的社会生活层面,并将下层社会骇人听闻的罪孽与

粗俗原原本本地载入了当时被视为神圣的文学篇章。这正如别林斯基说的那样，自然派不再喋喋不休地讨论时尚文学最为喜爱的“人类的本性和生活的最高理想”，而是将自己的艺术镜头，指向了底层人民骇人听闻的黑暗生活状况，并且将“所谓的‘群氓’，特别是把‘群氓’作为自己的主人公，以极深的关切研究它并使它认识自己”，他们大胆而真实地“描写卑鄙下流的生活”，在人民中间唤起“对崇高的美的思考，对理想的忧思”。（《别林斯基全集》，第4卷，第502页，莫斯科，1953年。）更令人难堪的是，自然派作家的语言一无例外地粗俗谐趣，一无例外地摒弃了贵族温文尔雅的沙龙语言，并且毫不迟疑地把下里巴人的日常口语一古脑儿送进了文学殿堂，光凭乡下人那种树皮鞋的臭味就足以使太太小姐们晕倒过去。所以，保守派文人格列奇在《莫斯科人》杂志上发表文章，极力抨击《钦差大臣》的鄙俗风格，并且横挑鼻子竖挑眼，一口气列举了戏剧中50多处同上层社会用词习惯格格不入的毛病。由此可见，面向民众的审美趣味构成了自然派同正统文学的艺术分野，也构成了自然派最显著最独特的流派风格。

尽管自然派没有共同的宣言，共同的组织，但是他们却有共同的文学刊物，这样，《现代人》杂志也就成为自然派作家联系的纽带和共同的心灵圣地。这种以杂志为中心组成的流派，在欧洲十分常见，例如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派”就是明显的先例。此外，德国的文学派别，多数也以刊物为中心来形成凝聚力，著名作家施莱格尔兄弟创办的《雅典娜神殿》，就开创了德国文学史上最具有影响的浪漫主义派别“耶拿派”。自然派明显受到德国与法国同行的影响，《现代人》的刊物编排方式，大体上便是以法国吉拉丹1829年创办的《时尚》周刊作为样板的。从版面形式来看，《现

代人》实际上是一种书籍型的杂志，印张比较多，风格类似于同仁组合的小说结集。众所周知，《现代人》是普希金于1836年4月创办的综合型文学杂志，文学色彩极为浓厚，他本人的作品《彼得大帝的欢宴》、《上尉的女儿》，果戈理的小说《鼻子》、《马车》，都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为了扩大这个刊物的影响，办出刊物的水平和档次，普希金先后吸收了果戈理、纳巴耶夫、纳巴耶娃、维亚泽姆斯基和奥多耶夫斯基等人参加编辑工作，使得这个杂志红透了半个俄国，成为19世纪前期最有号召力的刊物之一。1837年2月10日，普希金由于同丹特士决斗而去世，整个杂志群龙无首，便由彼得堡大学教授普列特涅夫接办。普列特涅夫是一位专门靠钻故纸堆讨生活的学究，缺乏起码的组织才能，结果刊物在他手里日渐萎缩，江河日下，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发行量也一落千丈，由普希金时期的3000份，跌落到了不足500份。1847年1月，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安年科夫联手合作，筹资3000银卢布，偿还了《现代人》欠下的债务，并从普列特涅夫手里接过了刊物的发行权。其后，在经营天才涅克拉索夫的精心策划之下，《现代人》走出维谷，再创辉煌，重新执俄国文学之牛耳，成为文学界最有影响的刊物。涅克拉索夫具有极其出色的组织能力，极其敏锐的头脑，极富远见卓识的前瞻性。他善于发现人才也善于任用人才，在他的号召和鼓动之下，一大批年轻有为朝气蓬勃的文学爱好者，包括托尔斯泰、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纳巴耶夫、纳巴耶娃、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纷纷加盟《现代人》。一时间，人才济济，群星荟萃，形成了气势浩大实力雄厚的自然派强大阵营。

1850年至1860年，是自然派辉煌壮丽的十年。这一时期，自然派在俄国文坛上占有压倒一切的地位，成为全俄罗斯最有影

响和最具号召力的文学派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大批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经过《现代人》风风雨雨的摔打和磨炼,文学风格迅速走向成熟,并以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作品,显示出自然派的文学实绩。涅克拉索夫发表了许多惊世骇俗的诗歌,从而把普希金开创的民族诗歌风格推向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并同纳巴耶娃合作,于1856年推出了《涅克拉索夫诗集》。屠格涅夫则发扬了果戈理的批判传统,先后推出了《猎人笔记》(1851)、《木木》(1852)、《罗亭》(1856)、《贵族之家》(1856)、《前夜》(1860)。托尔斯泰则出版了他的自传体三部曲《幼年》、《少年》、《青年》(1851—1856)。1853年加盟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也深受这些同龄人的鼓舞,写下了戏剧《肥缺》(1857)、《养女》(1859)、《未完成的喜剧》(1859)和他最辉煌的峰巅之作《大雷雨》(1859)。

然而,自然派花团锦簇的繁荣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危机,随着时间的延续和成就的扩大,成员们彼此之间的不信任日益加剧,并不断地进行着矛盾的积累,从而为危机的爆发源源不断地增添着能量。其道理是十分明显的,从自然派生命个体的生成结构来看,它是一个十分松散的艺术派别,既无统一的组织也无统一的纲领,缺乏政治理念和人文理念的认同性,除了依托《现代人》这个刊物的共同利益之外,整个流派的结构形态处于松散状态。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从果戈理创立这个流派开始,它的机体形式就存在一个二元构合的异质结构。而异质结构的高熵值和不稳定性,决定了这类合作不可能持久。自然派事实上包容了两个作家群体,一个是涅克拉索夫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群体,例如刊物评论栏目主持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人,他们像憎恨瘟疫一样憎恨特权,始终保持着极强的平民自尊。另一个是屠格涅夫代表的贵族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人数更多,实力

更强,对社会的影响力也更大,属于这一流派的强势群体。例如冈察洛夫,原本就是彼得堡书刊检查官,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托尔斯泰则是一位性格倔强的贵族,对平民知识分子怀着一份深深的反感。中间派安年科夫虽然同涅克拉索夫保持着相当良好的私人关系,却对《现代人》杂志越来越激进的平民化风格表现出明显的疏离。由此可见,自然派内部成员同床异梦的异质结构,其本身就在酝酿着分裂的危机。这类贵族知识分子,可以同《现代人》共患难而不可共富贵。他们在《现代人》创办初期,的确对这个杂志表现出极其浓厚的兴趣与忠诚,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才华得到了磨砺,他们的名声得到了张扬,他们的风格逐渐成熟,并且已经获得了文学界公认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人》一类初学者的园地已经无法为他们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艺术生存空间,于是这个杂志在他们心目中也就日渐失去光彩。在他们眼里,外面的世界更奇妙,外面的风景更壮丽,因而走上独立闯荡的道路,寻找自我发展的更大机遇,也就成为他们的共同主题。1857年2月,托尔斯泰退出《现代人》,标志着自然派分裂的开始。当时,托尔斯泰的小说《青年》发表在《现代人》1月号上,作品狂热的内化倾向和个人道德自我完善一类喋喋不休的说教引起了评论版编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强烈不满,他写信给屠格涅夫指责说,《青年》是作家的败笔,“满纸荒唐话”,“一笔糊涂账”,“庸俗、无聊、荒谬,是愚蠢的孔雀在炫耀它的尾巴”。托尔斯泰在得知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一评价之后,便愤然退出了《现代人》。接着,他的退出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奥斯特洛夫斯基、冈察洛夫、格里戈罗维奇等贵族作家纷纷尾随其后尘,演绎了一出人去楼空的活剧。1860年1月,屠格涅夫在《俄国导报》这个保守刊物上发表了长篇小说《前夜》,杜勃罗留波夫看了以

后，便写出了评论文章《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准备送交《现代人》2月号发表。杜勃罗留波夫将《前夜》解释为俄国革命的前夜，并试图在小说里面寻觅出强烈的革命气息。当涅克拉索夫将这篇稿件送交屠格涅夫审阅的时候，政治态度十分温和的屠格涅夫为此大为恼火，立刻要求涅克拉索夫不要发表这篇文章，并且怒气冲冲地下达最后通牒说：“你可以选择，我，或者杜勃罗留波夫。”结果他的提议遭到涅克拉索夫的断然拒绝，于是屠格涅夫一怒之下，愤然退出《现代人》。总之，屠格涅夫是最后一位退出《现代人》的贵族作家，他的这一决定，标志着自然派的瓦解和这一流派繁荣时代的终结。

但是，一个流派的瓦解并不意味着它的艺术生命的灭亡。这是因为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一个流派的艺术生命，流转于这一作家群体的共同风格而不依附于一定的组织形式和成员关系。这类流派瓦解而流派艺术生命长存的事例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例如现代法国最著名的文学流派之一——超现实主义就是如此。1924年11月，布勒东在巴黎发起成立超现实主义，并创办了《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这个流派在20年代颇为红火了一阵，可是到了1932年4月，超现实主义主将阿拉贡、艾吕雅等人宣布退出超现实主义运动，改换门庭投向了社会主义文学。由于阿拉贡等人的退出，这一流派作为完整的作家群体早已不复存在，然而这个流派的艺术生命并没有因此而灭亡，相反却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以至于日本的新感觉派、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以及李金发代表的中国现代派都明显地承续了这一流派的艺术基因。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布勒东直到这一流派瓦解26年之后的1958年，仍然在巴黎举办超现实主义成就展览，甚至还获得了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奖的提名。由此可见，流派的瓦解并不等于